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从刊

罕为人知的 中日结盟及其他

——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

孔祥吉 [日]村田雄二郎 著

D829 313
K7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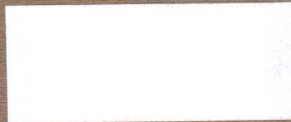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

罕为人知的 中日结盟及其他

——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

孔祥吉 [日]村田雄二郎 著

SB243/0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
孔祥吉 [日]村田雄二郎著. —成都:巴蜀书社,
2004.3 ISBN 7-80659-568-6

I. 罕... II. ①孔... ②村田... III. 中日关系—国
际关系史—研究—清后期—文集 IV. D829.3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6055 号

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

——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

孔祥吉 [日]村田雄二郎 著

- 策划组稿 梅锦辉
责任编辑 梅锦辉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责任校对 潘 锦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盐道街 3 号 邮编 610012
总编室电话:(028)86656816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 蜀 书 社
发行科电话:(028)86662019 8665827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福利东方彩印厂
版 本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2.25
插 页 6
字 数 280 千字
印 数 5500 册
书 号 ISBN 7-80659-568-6/K·75
定 价 30 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研究丛刊》总序

李文海□

《研究丛刊》是为完成清史编纂工程而出版的四种丛刊中的一种（其他三种是《文献丛刊》、《档案丛刊》和《编译丛刊》），其任务是及时编辑出版清史专题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

修纂清史是新世纪一项规模宏大的文化工程。中央对新编的清史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那就是：“编纂的清史质量要高，必须是精品，要注重科学性和可读性。确保编纂出一部能够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的高质量、高标准的清史巨著，使之成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传世之作。”（2003年1月28日李岚清在清史编纂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一个极高的标准，要达到这个标准，需要有很多的条件，作艰苦的努力。其中最重要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始终不渝地把全部工作建筑在对清代历史的深入研究和不懈探索的基础之上。

专题性研究同综合性学术成果的关系，是任何一个学术工作者都十分清楚的。专题性研究是基础，综合性学术成果则是概括、提炼、深化和升华。一部优秀的综合性学术成果的产

生, 又为更加宽阔、更加深入的专题性研究提供契机, 开辟道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如果没有上个世纪八十多年对清代历史的各个方面的专题研究, 也不可能有今天提出清史编纂工程的成熟条件。《清史稿》的不如人意, 除了其他种种原因之外, 整个学术界缺乏对清史的前期研究, 显然也是一个重要的先天不足。现在, 清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清史学术园地硕果累累, 这正是历史赐给我们的能够超越前人的重要保证。这里, 还需要强调的是, 要真正能够写出符合中央要求的“清史巨著”和“传世之作”, 不但要正确吸收和充分反映已有的清史研究的学术成果, 而且在修纂过程中, 还要继续进行多方面和多角度的专题研究, 使我们对清代历史的认识, 不断扩展新的视野, 作出新的概括, 达到新的境界。

2

根据这样一些想法, 我们希望《研究丛刊》的出版, 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 一方面, 为清史编纂工程不断提供新的研究成果、新的学术资源, 使新编的清史真正站在学术前沿, 具有较强的时代性特征; 另一方面, 在清史编纂工程不断前进的过程中, 发现和提出新的研究课题, 拓展和深化清史专题研究, 发挥清史编纂工程对整个清史研究的带动作用 and 推动作用。另外, 有些难以为新编的清史包涵和容纳的重要研究成果, 也可以通过《研究丛刊》单独发表。总之, 我们希望《研究丛刊》成为清史编纂工程同史学界、扩大一点说同学术界、同社会联通和交流的一座学术桥梁, 一个学术平台。

为了编好《研究丛刊》, 我们将按照学术规律的要求, 制订明确的工作规程。除此之外, 我们仍然想强调几点, 作为编委会和作者、读者共同努力的方向。

一是要尊重和提倡学术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

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对于学术说来，也是学术发展的本质要求。因为学术的发展，从根本上来说，无非是对未知的探求。如果学术一味因袭前人，墨守陈规，亦步亦趋，人云亦云，因循守旧，固步自封，那学术就没有了生命力，没有了活力，也就失去了存在的资格和权利。客观世界是千变万化的，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了解和认识应该不断地发展变化；人的社会实践是永无止境的，我们的理论创新也就没有止境。即使是像历史学这样的学科，也应该在历史资料的发掘和掌握、历史现象的判断和分析、历史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等方面，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名符其实的学术工作。

当然，创新不是天马行空，随意臆测，不是无根据的空想瞎说。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理论创新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前提，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走上歧途。”历史学的创新，当然应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同时，学术创新，一是必须符合客观实际，对于历史学来说，应该符合历史实际；二是应该正确地对待传统。对传统必须作辩证的、科学的分析，好的就坚持、就继承；坏的或者错的就否定、就摒弃，并用新的观点、新的结论取而代之，学术就在这种辩证对待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得到前进。

一是要坚持“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研究丛刊》对书稿的取舍，除了坚持“二为”方向即“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的政治前提外，惟一的标准就是学术水平。除此之外，作者的职位高低、资历深浅、声望大小、辈份长幼以及与工作人员的关系亲疏、人情往来之类，一概都不应成为影响学术判断的因素。我们深知，此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

有相当的难度。但我们必须这样做，才能体现学术的公平和公正，使已经受到某些污染的学术净土尽量保持自己的纯洁。所谓学术水平，当然不是抽象而不可捉摸的。我们希望，收入《研究丛刊》的著作，在选题上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在内容上有原创性的独立见解，在方法上能做到观点和资料的统一，在文字上清新流畅，尽量体现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这样的作品，我们是万分欢迎的。

还有一点，就是要坚持“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一点不错的。就学术来说，没有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相互切磋，相互讨论，相互争辩，学术就不能进步，更谈不上学术的繁荣。梁启超就曾说过：“学问非一派可尽。凡属学问，其性质皆为有益无害，万不可思想统一，如二千年来所谓‘表彰某某，罢黜某某’者。学问不厌辩难。然一面申自己所学，一面仍尊人所学，庶不至入主出奴，蹈前代学风之弊。”（《清代学术概论》）在这里，梁启超不仅讲到了“学问不厌辩难”的道理，而且还讲了学术论辩应抱的态度。确实，在学术界，恐怕还不能说“双百”方针已经贯彻得很好了。过去，有政治上“左”的影响和干扰，但这个问题现在似乎已不是个问题，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学术大环境。

因此，有一个正确态度去对待学术争鸣，就显得尤其重要。如果在不同学术观点之间，能够怀着追求科学真理的目的，抱着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的态度，采用平心静气、充分说理的方法，具有海纳百川、虚怀若谷的学者风度，那末，学术争论愈充分，学术气氛就愈活跃，学术研究就愈深入，学术队

伍也就愈加团结。我们愿意为形成这样一种民主和谐、生动活泼的学术氛围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研究丛刊》的成败，说到底，在于学术界乃至广大读者的关心和支持。我们热切地期待这一点，并且将用我们的工作来努力争取这一点。

2003年8月8日

前言

中国与日本是东亚的两个一衣带水的邻邦。长期以来，文化之彼此交流，思想之互相渗透，对各自历史发展进程，曾经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隋唐之际，先进的中国文化传播到日本，促进了日本列岛文明蓬勃地发展。到了近代，由于欧风美雨袭来，日本率先采用西法，百度维新，骤致富强，反过来又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日本的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1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1877年11月27日），随何如璋出使日本的参赞黄遵宪，在东瀛耳闻目睹了明治维新后十年的巨大变化，大发感慨。他后来写诗称：“滔滔海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黄遵宪还特别对此句加以注解云：“在日本时，与子峨星使言：中国必变从西法。其变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强，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辖，或如波兰之瓜分，则吾不敢知，要之必变。”^①子峨者，何如璋也。本书即由何如璋使日开篇。

① 黄遵宪：《人境庐诗草笺注》卷九。

历史很快验证了黄遵宪的高瞻远瞩。甲午战争之后，在饱受日本侵略者蹂躏的神州大地上，迅速刮起了变法的春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大声疾呼，唤醒国人。他们所高举的旗帜上，书写的是“以开创之势治天下”，更张旧法，救亡图存成了当时的主旋律。百日维新运动亦应运而生。

仔细披阅中日两国历史文献，可以清楚地看出，康有为所发起的百日维新，实际上是一场仿照日本明治维新的改革运动。日本外务省档案史料清楚表明，在变法运动高潮期间，光绪皇帝亲自书写谕条，命令军机大臣王文韶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到日本公使馆与代理公使林权助商议中日两国亲交事宜。^① 这位紫禁城里的年轻帝王甚至还书写过“硃笔谕条”，要派康有为赴日本“坐探变法事宜”。不言而喻，一心一意欲有所作为的光绪皇帝已经把明治天皇当作自己推行新法的楷模。

2

至于明治维新的精髓，可用十二字来概括：采世界之良法，决万机于公论。康有为在戊戌春季上书统筹全局时，曾把明治维新的经验归结为“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曰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并认为此乃“变法之纲领，下手之条理”。^②

在变法高潮期间，康有为还曾两度将《日本变政考》进呈给光绪皇帝，并且上书陈述进呈此书之深刻用意。康氏称：

“惟泰西国数极多，情势各异，文字政俗，与我迥殊，虽欲采法之，译书既难，事势不合，且其富强精巧，皆逾我百倍，骤欲致

①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日清两国国交亲善之文件》。

② 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

之，下手实难。惟日本文字政俗皆与我同，取泰西五百年之新法，以三十年追摹之，始则亦步亦趋，继则出新振奇，一切新法，维妙维肖，……吾地大人众，皆十倍日本，若能采鉴变法，三年之内，治具毕张，十年之内，治化大成矣。”^①

一言以蔽之，康有为认为采用日本经验，乃是向西方学习的捷径。因此，他恳求光绪皇帝假日本为向导，以日本为图样，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凡日本行之而错谬者，中国不复践之；凡日本的成功经验，中国但取而誊写之。这样“取而鉴之，举而行之，按迹临摹，使成图样”，一转移间，便可以“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矣”。^②

实际上，百日维新中康有为等人的变法活动大都是围绕“采世界之良法，决万机于公论”而筹划的。他的派游学，办报刊，开言路，改科举，都是朝着采世界之良法的方向而努力；至于决万机于公论，他解释说中国守旧势力实在太太，在当时情况下开议院是帮倒忙，故改为开制度局。即使如此，守旧势力亦不能容忍。

3

慈禧等守旧派对康有为如此温和的改革都不能接受，更不要说像明治维新那样“采世界之良法，决万机于公论”。对于慈禧、荣禄等执政者来说，权欲私利高于一切，他们过惯了专制独裁的日子，要他们“采世界之良法，决万机于公论”无异于缘木求鱼。政变后，守旧势力气势汹汹，不可一世。他们砍掉的似乎并不是杨深秀、谭嗣同等六君子的脑壳，而是斩断了清王朝的一线生机；他们所废弃的也不只是戊戌新政，而是断送了清王朝的整个前程。

戊戌政变虽然只是杀掉了六君子，罢免了十多个官员，但是，中国政局却一天天走向它的反面。裁学堂，关报馆，关押维新派人

① 康有为：《进呈〈日本变政考〉等书，乞采鉴变法以御侮图存折》。

② 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序。

士，一切复旧了，而且愈演愈烈。

慈禧太后对英国与日本在戊戌政变后掩护维新派人士逃脱，非常不满。尤其是康、梁在日本期间发表了大量反对清政府的言论，更激起这位独裁者的新仇旧恨，于是她采纳小人杨崇伊所献“联倭杀康”的阴谋诡计，派刘学询与庆宽等人，携带文物珍品到东瀛去上演了一场中日结盟的闹剧。慈禧、奕劻等人自知此举乃是见不得人的勾当，故当结盟闹剧进行之时就十分诡秘，居然连军机大臣与总理衙门大臣都不让知情。事后他们又千方百计掩盖此页历史，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很难找到与中日结盟闹剧直接有关的上谕、国书、密电等历史文献。

4 慈禧一伙由戊戌政变后仇视变法，演变为憎恨外国，并且发展到利用义和团去向列强“大张挞伐”，“一决雌雄”。守旧派徐桐甚至上书建议，杀了国内所有的洋人，关起国门享受天下太平。这是多么剧烈的变化，它掉转了历史航船的方向，从此中国的政局变得多灾多难。戊戌政变发生后，清政府忽然像失去了前进方向的航船，盲目地在大海中飘荡，面对狂风巨浪的袭击，没有支撑多久就沉没了。

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与中国并无根本区别，同样是地瘠民贫，满目疮痍。有的地方甚至比中国更落后些，北海道尚被称作“虾夷之区”，荒无人烟。日本与中国一样是西方列强掠夺奴役的对象。然而，曾几何时，情况发生了变化。中日之间的距离迅速拉开了。面对历史，冷静思考，真令人仰天长叹，扼腕痛心。天耶？人耶？

为了加深对晚清史及中日关系史的研究，我们于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科地域文化研究专业举办了一次“晚清历史与档案研习班”。在研习班进行期间，除了讲授中日文课程外，还带领学员们先后去

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厅研究所图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等处深入发掘史料，引深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与思考。

这次晚清历史与档案研习班是由村田雄二郎主持的，他还担负了日文课程的讲授和中文课程的翻译工作。孔祥吉则讲述了中文课程。

参加研习班并为本书提供《日本外交文书》及日文档案原件中译工作的学员有：

孙伟珍	陈凌虹	佐藤隆	竹元规人
上原尚大	姜光文	石井刚	田中靖彦
小池求	金东建	周东怡	大泽肇
大桥义武	王亚鹏	彭妮妮	小军

特别应予以指出的是，孙伟珍、陈凌虹两位学员利用暑假为本书提供了不少翻译工作；大泽肇则协助联系了参观访问的有关事宜，颇著辛劳。再有，台湾东吴大学日语系前主任林文贤副教授适在东京大学作访问学者，亦来参加研习班，并承担档案文件的翻译工作。

此书于2003年9月底截稿，故后来参加研习班的小野寺史郎、李艳丽、Viren Murthy等学员的译作未能全部反映出来。实际上本书的问世，是凝聚了研习班集体的智慧与辛劳的。

本书完成之后，戴逸老师、李文海老师、王雪樵同年及国家清史编委会诸同志分别阅看书稿，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巴蜀书社梅锦辉同志从组稿到编辑作了许多贡献，谨此致以谢忱。



作者简介

孔祥吉（右）

1943年生，山西洪洞县人。原为中国人民大学晚清史研究室主任，现为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东京大学客座教授。专门从事晚清史著述。

村田雄二郎（左）

1957年生，东京都人。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教授。从事中国近代史、文化史研究与教学。

外務省諸位大人殿
 閣下照自客秋蒙友人
 拔救入境以來
 貴國憐護備至救其
 三死感戴之情何可言
 喻今康君已赴他州
 難下之質坐食於此萬
 難自安况照乃無志之
 夫在北京時專以調和
 兩宮為務得罪之由亦
 不過因保薦康廣仁
 梁啟超為顧問官耳及
 來貴國照亦從未指斥
 而太后之短故北京亦無
 刺照之意今請
 貴省以後不必須給保
 照為一漁一摵皆
 天皇與諸公之德也且照
 無聲無臭必不礙兩國
 交誼所有感戴辭謝之
 情謹此上聞伏乞
 答諒
 高山忠照頓首

圖一：王照在康有為為離日後，主動上書放棄日本政府提供的政治庇護

皇
治
五
年
五
月
至
明
治
十
六
年
七
月

日 日

清佛戰爭一件

第

一

图二：日本外务省有关中法战争类档案之封面

李爵相鴻章由上海三次五百里陳奏越南事件原摺係

皇太后存留宮中除軍機大臣以及綜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得以籌畫商辦外其餘臣工概不得與聞漫云百餘金即數百金亦無從得其底稿萬難設法有負

委任尚望原情格外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主戰者多主和者少至六部九卿科道等官亦各有議論如指定何人及如何立論並從得知不敢妄言

右文那其官人渡部書記呈上內教

圖三：駐日公使何如璋向日本情報人員呈遞的第一件密報